

赤壁之战与三国鼎立

张 大 可

发生在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以少胜众，以弱克强的典型战例。这是曹、孙、刘三家的一场大会战，是人们喜欢评论的一个热闹节目。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用了八个回目（第四十三回至第五十回）的巨大篇幅来描写赤壁之战，威武雄壮，精彩动人。这场大会战的特点是“群英会”，经过十几年征战锤炼的三方英杰会聚一堂作决定历史命运的大决斗，结果孙刘联军取得胜利，曹操大败亏输，从而定下三分鼎峙之局。我们讲三国鼎立，就要从赤壁之战讲起。

但是，长期以来，一些教科书和学术论文都没有对“赤壁之战奠定三国鼎立”这一命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因而导致了有的人对赤壁之战这一事实本身也提出了质疑^①。因为胜败兵家之常，若单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以一战的胜负来解释鼎足三分是远远不够的。曹操虽然打了败仗，但并未丧失元气，为什么一败之后再不敢窥临大江呢？更令人不解的是，用兵如神的曹操，常能以少胜众，曾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而他发动的赤壁之战，二十几万大军却被一个三十四岁的青年将领周瑜率领的三万二千孙刘联军所击败，^②岂非反常？难道真有运数，曹操命中注定要作“周文王”，使历史鼎足三分吗？

当然没有运数。三国鼎立并不符合人民的愿望。早在公元198年，袁涣就对曹操说，“自大乱以来十数年矣，民之欲安，甚于倒悬，”^③规谏曹操收拾人心，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曹、孙、刘三家都是打着统一的旗号才得以立国的。可见三国鼎立是不符合人民愿望的。

但是，三国鼎立终于出现了，曹、孙、刘三家谁也没有完成统一。怎样看待三分历史？它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走了曲折的道路？研究赤壁之战的意义就在于此。已成学术界定论的观点认为：“三国鼎立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其理由是：“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中国。”^④这就是三国鼎立的“必然性”理论，可名之曰“经济均衡论”。

毫无疑问，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孙、刘割据的物质基础。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十分注意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如说江东是“国险而民附”，荆、益是“民殷国富”、“沃野千里”。而当时北方，历时十九年的军阀混战，人民被屠杀，土地荒残，户口锐减，造成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象。所以吴国朱治说：“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士叹于外，妇怨乎室，加之师旅，因之以饥馑，以此料之，岂能越长江与我争利哉？”^⑤但是经过了秦汉四百余年统一的广大人

民，具有共同的文化和生活习俗，厌恶战乱，渴望统一，这才是带根本性的历史必然。如果我们做一番纵横的历史分析，十分鲜明。从纵的历史来看，凡改朝换代，在新旧王朝交替之际，总是出现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局面，这才是历史的常例，东汉末年的战乱亦不例外。秦末战乱和西汉末年的大混战，人口死亡大半，户口什存二、三，汉高祖用了五年，汉光武用了十二年就统一了中国。刘邦统一天下时，“天子不能具醇駟”，其经济残破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曹操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十分注意经济的恢复。公元196年，他迎献帝都许，“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⑥当年许下屯田，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廩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⑦可见用北方经济萧条来说明统一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理由是不充分的。从横的历史来看，既然南方经济发展，足以抗衡北方，但同样是江东形胜，王朗、华歆却不能守，同样是荆益沃野，刘表、刘璋不得以为资，难道真是天所以资刘备，而使孙氏“应运东南”吗？简单的“经济均衡论”是不能解释复杂的历史原因的。这一理论也无法解释赤壁之战胜败的原因，为什么能征惯战的曹操，在他用兵最得意的时候，却被弱小的孙、刘联军所击败？历史的原因，只能用历史的事实本身来说明。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南北经济的均衡是三国鼎立的客观条件之一。前已述及，诸葛亮和吴国的朱治两人分别论及荆益沃野和江南经济的发展，是刘、孙立国的基础。但这只是可能性，并非必然性。如果从经济上探索原因，与其说南北的经济均衡，宁勿说是两汉世家大族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势力，导致了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两汉的察举辟制度，经学的家法传统，世族间的婚姻联系，使得一些大族把持了政局。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二袁以讨董卓为名，行割据之实，是世家大族分裂了东汉政权。所以王夫之说：“操之攘汉，袁绍始之。”^⑧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在干戈扰攘之中，二袁、吕布、刘表等腐朽的世家大族一个一个被消灭。曹操是打着“奉辞伐罪”的旗号消灭他们的。这就生动地说明了统一的因素压倒了解裂割据的因素。特别是曹操发动的荆州之战，兵不血刃一鼓下荆州，大大发展了统一的力量。益州牧刘璋接连三次派遣使者阴溥、张肃、张松纳款请降。曹操声威远播，也震撼了江东。豫章太守孙贲“欲遣子入质。”^⑨孙权的柴桑行营，军心浮动，张昭、秦松等元老重臣，同声主和。但是，曹操南下荆州之后出现的统一全国的可能性却被赤壁之战葬送了。曹操发动的赤壁之战，是在一个时机不成熟的错误时间打了一场必败的战争。表面看是孙刘联军打败了曹操，而实际是曹操发动的赤壁之战推动了孙、刘结盟，替诸葛亮的隆中计划创造了历史条件，乃是曹操非始料所及的。

原来孙氏集团的既定方针是极长江之险与曹操抗衡。早在公元200年，鲁肃过江，就建议孙权，“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⑩甘宁亦有此说，曰：“南荆之地，……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又说：“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⑪至于周瑜，他至死念念不忘西取巴、蜀、翦除刘备，“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⑫公元207年，孙权移营柴桑，于公元208年春亲自统兵抢先发动了夺取荆州之战。诸葛亮在公元207年已发表了《隆中对》，提出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三分策略。但是这一路线与孙权集团的战略方针大相径庭，加上刘表与孙权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孙权是要吞并荆州，而不是联合荆州。刘备寄人篱下，无立锥之

地，没有联吴资本。所以赤壁之战前，隆中路线只不过是刘备集团的“单相思”，当时并没有出现孙、刘结盟的政治气候。按照这一历史的本来面貌评价《隆中对》，与其说诸葛亮预见了三足三分，宁勿说他是依靠人谋来力争三分。隆中路线能否实现，有待天下之变。

但是，诸葛亮的分析是有根据的。他隐居隆中十年，洞察天下大势，替刘备制定了三分天下以求统一的策略，是唯一具有可能性的路线。《隆中对》的主旨是强调人谋来引导历史的面貌。

按照古代政治家总结的历史经验，要统一天下，须得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缺一不可。诸葛亮的《隆中对》就是根据这一理论分析天下大势的。从天时，即当时的形势来看，曹操统一了北方，占领了兖、豫、冀、徐、青、幽、并、司隶等八州之地，三分天下有其二，人力、物力、财力都占了压倒的优势，“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也就是说，曹操统一了北方，孙氏巩固了江东，南北已成对峙之局。但是孙氏不足以单独对抗曹操，而占有地理形胜的荆益尚在庸主手中，刘备又恰在荆州得有人望，所以刘备的事会之来，仍有希望。从地利来看，刘备若跨有荆益，也就有了联吴资本，一定能成鼎足之势。从人和来看，刘表、刘璋是坐守待毙之主，不能网罗天下英雄。在乱世之中，“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智能之士思得明君。”^⑬刘备以他的信义，紧紧地团结了关羽、张飞、赵云等一批人才，“皆万人敌”^⑭，又得诸葛亮辅佐，所以被目为天下英雄。用今天的话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可见“人和”，并不只是一般民众和地主集团的拥护，更重要的是得到智能之士的归附，形成一个吸引民众的政治核心。曹、孙、刘三方都有统一天下之志，各自网罗了一批人才，形成了三个领导集团，这就是鼎足三分的政治基础。

刘备既是“帝室之胄”，又“英才盖世”，从二刘手中夺取地盘是绰有余裕的。但是，寄寓荆州的刘备，要从同姓手中夺地盘，策略上不可不慎重。因为他打的旗号是“兴复汉室”，同室操戈，怎能赢得人心归附？刘备两度得徐州，又两次失徐州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后来进蜀时还对庞统说：“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谄，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⑮所以刘备在《隆中对》之后仍按兵不动，他是在等待时机。可是深谋远虑的曹操是不允许刘备从容占有荆州的。他不失时机地发动了荆州战役，打破了刘备集团的希望，几乎使诸葛亮的隆中路线变成泡影。刘备打算步田横的后尘，远遁苍梧。“当此时，曹操附手，谓天下已定。”^⑯但是不测的风云给曹操带来了厄运。由于他急于东进，推动了孙、刘结盟，又给诸葛亮的隆中路线带来了转机。请看诸葛亮的分析：

今将军（指孙权）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

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⑰

这段话是诸葛亮使吴在柴桑行营对孙权讲的。诸葛亮抓住曹操东进，孙权不肯投降这一大好“天时”，以荆州使者身份与孙权谈判，用激将法煽起孙权的抗曹决心，签订了鼎足三分的双边同盟。孙权在鲁肃的赞助下，总结了曹操各个击破北方军阀的历史教

训，认识到“非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在大敌当前，作了让步，接受了打败曹操，荆州归刘的条件，这就达成了巩固的同盟。赤壁战后，孙权履行了盟约，借荆州给刘备，消息传到北方，惊得曹操失魂落魄，“方作书，落笔于地。”^⑮

为什么孙刘联盟，曹操必败呢？因为刘备驻屯荆州七、八年，已赢得汉沔襄樊地主集团的支持。“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⑯。刘备是荆州的一面旗帜。他还奉有衣带诏讨“贼”（指曹操），是人们心目中的“正统”所在。对曹操来说，荆州新附，立脚未稳，故不敢在江南决战。所以周瑜西上，“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这样一来，联军夺回了天堑，曹操迫不得已，“方连船舰，首尾相接”，为联军的火攻创造了条件。曹操南下是“奉辞伐罪”，孙、刘联合则可以揭露他“托名汉相，其实汉贼”。联军凭江而守，处于内线作战，兵员补充和粮运有江东作后盾，故“愈守则兵愈增、粮愈足，而人气愈壮”^⑰。所以孙、刘结盟，以刘备在荆州的声望，加上江东的士众，在政治上压倒了曹操，成为“正义”之师，故能在军事上发挥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即使不用火攻，“持之数月，而操亦为官渡之绍矣。”^⑱

诸葛亮和周瑜分析曹军必败，其因有四：第一，北土未安，操有后患；第二，北方步卒，不习水战；第三，战线太长，供应不济；第四，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曹军的这些败因，都不是根本性的。曹操之败，失在于“急”。为曹操计，应休整荆州士众，恢复荆州战后的经济，成为前进的基地。在政治上要发展荆州战役的声威，阻止孙、刘结盟，徐图进取，要不了几年或可统一江东。总之，不能让刘备占有荆州，形成鼎足。这一谋略是当时曹操的谋士贾诩献纳的。他对曹操说：“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饷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⑲曹操的另一个谋士程昱也提出了警告，急于东进，将推动孙权助刘备。这些正确意见，利令智昏的曹操均不采纳。“权果多与备兵，以御太祖。”^⑳

骄兵必败，赤壁之战也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曹操发动荆州之战，计划周密，打得非常漂亮。南下之前，曹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和动员。他罢了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并自领丞相。他镇压了拥汉派的世族领袖孔融。又征调关西马腾入侍，拜卫尉。曹操还在郾城开人工湖训练水师，决心要一举平定江南。在完成了这些布置以后，公元208年七月曹操亲率三十万大军南下。他用荀彧计，“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㉑，杀了个刘备措手不及，一败涂地。刘琮投降，曹操兵不血刃一鼓下荆州，轻易取得的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幻想着凭借这战胜的余威就可以吓倒孙吴。他给孙权下了一封战书，十分骄狂地宣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㉒孙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响震失色。”^㉓消息传来，更加滋长了曹操的骄矜。他不礼遇益州使者张松，把他推到了刘备一边。西晋习凿齿评论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㉔这话是一针见血的。

曹操不听谋士贾诩和程昱的劝谏，固执地轻躁东进，并不仅仅是胜利冲昏了头脑，还有更深刻的政治原因。曹操不同于刚愎自用的袁绍，而是一个“才略不世出”的雄杰。他轻躁东进是为了那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押赌注。他的政治目的就是梦想一举平定江南，实现梦寐以求的篡汉自代。排除正统观念，谁坐天下都一样，主要看他政治是否

开明一些。何况统一北方是曹操自己打出来的。须知，这是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古代，曹操篡汉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在政治上沾刘氏的光，但也蒙受了“汉贼”之名而不能辞。曹操之急于东进的心情，早在公元207年春二月发布的丁酉令上已按捺不住地显露出来。令文说：“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其促定功行封。”^⑳一个“促”字表现了曹操的紧迫感。他大封功臣二十余人列为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又抚恤死事之孤。曹操此举是预演着开国大典的帝王之礼，收买人心，鼓励军心。当然，曹操“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早日完成统一大业是无可非议的，是正义的事业。但是由于他篡汉之心的过早萌动使他急于求成，冒险发动赤壁之战，葬送了统一的大好形势，这是无可讳言的。

曹操是一个善于权谋的政治家。赤壁之战以后，孙权借荆州与刘备，三分天下的形势已具雏形，曹操眼看由他来完成统一的事业不大能实现了，于是决心做“周文王”加快培植曹党势力，为儿子曹丕代汉奠定基础。曹操欲擒故纵，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冬十二月下了一个此地无银的“自明令”。清严可均辑的《全三国文》题名《让县自明本志令》。所谓“让县”，是曹操减退出自己受封的武平侯国三县二万户，用以换取封众子为侯。在这之前，朝廷有封曹操三子为侯之令，曹操“固辞不受”。现在，他自己退出三县“以分损谤议”，也就是要洗刷一下他那“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的狼藉名声，声明自己决不代汉。政治家的宣言是否真实，应以他的实际行动来检验。曹操下“明志令”不久，就在建安十六年春正月以世子曹芳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付丞相。接着又封五子为侯。建安十七年冬又指使董昭建言尊立自己为“魏公”，并割据冀州为王国根据地。尚书荀彧表示不满，曹操毫不手软地迫死荀彧。荀彧长子荀恽乃曹操之婿，荀彧为曹操主要谋士，由于荀彧忠于汉室，曹操立即加害。荀彧死后，曹操称“魏公”，建安二十一年称“魏王”。曹操称王距离皇位只有一步之差了，这都是曹操在“自明本志”与“再三推让”的表演下一步步逼进的。这可以反证曹操急于发动赤壁之战的政治目的，由于私心的驱动而冒险了。

由上分析，赤壁之战奠定鼎足三分，不在于军事上一战之得失，而是曹操的东进政策促成了孙、刘结盟。这一点程昱作了深透的分析。《魏书·程昱传》记载说：

太祖征荆州，刘备奔吴。论者以为孙权必杀备。昱料之曰：“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权果多与备兵，以御太祖。

所谓“论者”，主要是指曹操。急于求成的私念，挡住了他的视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曹操只看到孙吴夺取荆州的决心，而看不到由于自己的紧逼会迫使孙吴改变方针联刘抗曹。鲁肃的转变就是生动的例证。曹操南下荆州，鲁肃立即向孙权提出联刘抗曹的策略，“同心一意，共治曹操。”^㉑诸葛亮使吴，陈说利害，孙权在大敌当前顾全大局，答应打败曹操，荆州归刘，并于战后实践了诺言，恰如程昱之所料，“权必资之以御我”。事势的发展，也真如程昱所说：“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这可说是曹方谋士程昱在赤壁战前预料到的天下三分。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曹操发动的赤壁之战，是在一个时机不成熟的错误时间打了一场必败的战争。”这可以说是曹操

的急于求成替诸葛亮的隆中路线搭了一个跳板。

从三国鼎立的整个形成过程来看，赤壁之战只是拉开了鼎足的序幕。三国鼎立的最初形成应以夷陵之战为标志。荆州是吴国的上流门户，汉中是蜀国的门户。公元二一九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得了汉中，二二〇年孙权又夺了刘备的荆州，才真正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当吴蜀夷陵之战爆发时，曹丕谋臣刘晔建议立即配合蜀国并兵灭吴，吴亡，蜀国不战自破。^⑩但是曹丕又忙于代汉自立而丧失了曹魏最后一次统一天下的“天时”。可见政治上的失计，总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总括本文论述，我们认为三国鼎立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走了曲折的道路，原因是复杂的。曹操发动赤壁之战葬送了大好的统一形势是政治上的最大失计；反过来则是诸葛亮、鲁肃三分路线的最大成功。三国历史，风云多变，很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三国鼎立是人谋的主观努力和政治家的失计影响了历史的面貌，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赤壁之战，曹操败北，刘备兴起，而后“关羽北伐，秭归蹉跌”，隆中路线遭挫折。“凡事如此，难可逆见”，历史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三国鼎立的偶然性又寓于历史的必然性之中，除了地理的均势外，曹操在政治上还有许多致命弱点。曹操权诈机变，心狠手毒，未能网罗天下所有英雄，造成了汉末人才分散，形成了三个领导集团。曹操残暴不仁，曾屠杀徐州五县男女数十万口，甚至颁布了“围而后降者屠”的反动法令，始终未能获得“天命攸归”的舆论，也就是老百姓并不十分喜欢他。曹操兵围献帝，失人臣礼，始终带着“汉贼”的帽子打天下。曹操的这些弱点为孙、刘所利用。因此，历史让曹操作了个半壁河山的“周文王”，看来是很公正的。

注释：

①尹韵公：《赤壁之战辨》载《光明日报》1981年3月31日第4版。

②关于赤壁之战曹方兵力，曹操号称八十万是虚张声势。据《吴书·诸葛恪传》：“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是较为可靠的数字。曹操得荆州，驻防各地分散了兵势，用在赤壁之战的第一线兵力只有一半，故《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周瑜说：“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总计二十余万。孙刘联军兵力，吴军三万，刘备派关羽、张飞率二千人助战，共三万二千，见《周瑜传》及《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③《袁涣传》。凡注《三国志》篇名，略去大题，只称传名。

④翦伯赞：《中国历史纲要》第二册第五页。

⑤《朱治传》注引《江表传》。

⑥⑦《武帝纪》。

⑧《资治通鉴》卷六十二《汉纪·献帝建安元年》。

⑨⑩⑪《读通鉴论》卷九。

⑫《朱治传》。

⑬⑭⑮《鲁肃传》。

⑯《甘宁传》。

⑰《周瑜传》。

⑱⑲《诸葛亮传》。

⑳㉑《程昱传》。

北魏末年关陇起义始末论略

施 光 明

关陇起义是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对关陇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史学界以往对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研究集中于六镇、河北起义，对关陇起义很少有人论及，本文对之做些探讨，并就教于大家。

一、关陇起义爆发的社会条件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在北魏前期的五十余年间，见之于史传的反抗斗争就有近百次。孝文帝即位后，进行了改革，全面推广汉化，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孝文帝死后，矛盾又趋激化，“魏自宣武已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委用非人，赏罚乘舛。于是衅起四方，祸延畿甸。”^①鲜卑拓跋贵族随着封建化的加深而日益腐败，他们醉心于汉族士族地主的生活方式，僮仆成群，妻妾结队，恣情纵欲，挥霍无度；激烈的土地兼并使均田制名存实亡，广大农民被迫

“飘藏他土，或诡名托养，散在人间；或亡命山藪，渔猎为命；或投仗强豪，寄命衣食。”^②统治阶级又佞佛成风，“寺宇壮丽，损费舍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③更加上水旱灾荒，年年不断，天灾人祸，纷至沓来，“贵富之家，童妾祛服，工商之族，仆隶玉食，而农夫阙糟糠，蚕妇乏短褐。”^④社会危机如此深刻，北魏王朝的覆灭已渐露端倪，而关陇地区尤为矛盾尖锐之焦点。

关陇地区，自魏晋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在这里生活着汉、羌、氐、匈奴、鲜卑等几十个民族，西晋时，郭钦曾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⑤。江统在《徙戎论》中也说：“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⑥北魏建立后，对各族人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关陇人民亦难逃其害。如正平元年（451），拓跋焘率军进攻刘宋盱眙城时，写信给守将臧质：“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

①《鹿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②《诸葛亮传》注引《默记》。

③《刘巴传》。

④《贾诩传》。

⑤《荀彧传》。

⑥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⑦《刘二牧传》注引《汉晋春秋》。

⑧《刘辟传》注引《傅子》。